

全球化不是消除多样性

[法] 乔治·贝尔图安

朱冬冬 译

在我担任欧洲共同体委员会驻英国代表团团长期间,我决定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当时是1971年。由于欧洲共同体与中国尚未建交,我请求对外关系委员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批准我前往。他很犹豫,最后向我作出了书面指示:“您可以冒个人风险和危险赴华访问。”您可以看出,我们走过了许多道路。于是,我前往拜会中国驻欧洲共同体临时代办。在那里,我受到了一系列人士的接待,他们每人手里拿着一本小红皮书,我记得每上一层台阶就有两个人挥动着红皮书。最后我到了临时代办办公室。会谈用英语进行,我以为会很短,最后持续了五个半小时。这是双方第一次进行交流,所有的内容在当时都是不可能的,但今天却成为现实。令我感到自豪的是,我在欧洲共同体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之间首次建立了联系。

我从中得出的结论是,有时冒个人风险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我想说的第二件事是,这次会晤使我回忆起1952年开始创立欧洲共同体的情形。当时是一片绝对混乱。所以,如果没有完全遵守时间表,您不必担心。因此,混乱成就了欧洲共同体的创立。我相信,如果有时我们感到有一点无序,这表明将建立未来的新秩序。

我们正在经历人类生活中最重大的历史转变时期。一般来讲,这一转变以和平方式进行,但它比各国历史上发生的战争和革命都走得更远。我想重复欧洲与会者向中国与会者提出的问题,同时也就中国与会者讲的几个问题提两点意见。全球化是对某种美国文化霸权的肯定吗?1950年在欧洲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提出了一种看法,历史学家可能对此有争议,但作为政治生活的实践者,

我们从中得出了一定数量的结论。这一看法直接与中国有关。19世纪是欧洲社会转变最激烈的时期。当形势变得令人无法忍受时,有三种可能的反应。第一种:力图推翻压迫人的制度。第二种是迁往别处。第三种就是顺从。大家可以回顾一下,最初组成美利坚合众国的是因无法忍受生活条件而逃离欧洲的欧洲人。因此,欧洲向美洲移民是一种革命现象。美洲曾经建立在遭受压迫的欧洲人的梦想基础上。随后,爆发了革命。大量移民特别是中国人突然涌入美洲,修建横跨北美大陆的铁路;被强行送往美国的非洲人受到压迫和奴役,但美国最初的政治实质是畅想更美好未来的欧洲人的政治实质。与此同时,在欧洲,留下的人进行了反抗,发动了革命,社会革命,共产革命,民主革命。这对中国的发展起到了直接影响。中国有时受到民主革命的影响,如1911年,有时受到共产革命的影响。换言之,我们的社会都曾受到震动,每次都把我们向现代化更推进一步。

美国霸权不是美国的。美国霸权是我们各国社会进行现代化尝试的霸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当我们开始进行尝试的时候,我们势单力薄。欧洲革命期间,我们曾想让美利坚合众国的欧洲梦想重返欧洲,力图组建欧罗巴合众国。因此,尽管美国政治与欧洲政治差别重大,但它们都是曾经追寻人类进步的同一个家庭的两分子。总之,如果说人类进步基金会是这次会议的建筑师,大家能够达成共识存在好几个原因。我们做了什么呢?我们将这一想法再次引入欧洲:我们不再是敌人,成为敌人毫无益处。于是,我们怀着耐心(因为在生活中无论做什么经常需要一个长期过程),成功地(布鲁塞尔可作为见证)为使原来相互敌视、相互残杀的国家走到一起共同努力。结果是,欧盟的成功可能重新引入多样性。每逢战争时期,多样性就会消失。每逢和平时期,多样性即变为可能。因此,在欧洲,我们当中的很多人不认为全球化是消除多样性的一种手段,相反,这使得我们可以更好地进行管理。我们准备与全世界各方建立并保持联系,这使多样性得以发展,而非相反。如果我们对中国感兴趣,如果我们认为可以在中国找到发展的启发因素,这是因为我们完全了解中国是一个整体,这个整体成功地使占全人类1/4的人口在归属于中国因素的共同爱国主义中生存在一起。我们理解这一点的重要性。在欧洲,我们开始适应中国的群体现象,因为你们第一次听到欧洲人说:“我们拥有五亿人口。”以前,我们说:“我们拥有一千万人口,五千万人口,六千万人口。”当时我们的心理只适应这些小数字。我们正在发现,五亿使我们处于大阵营之列,他们正在形成21世纪的未来人类。因此,我们非常好奇地想知道这个十三亿人口的体系如何运作。我们好奇地想知道这一庞大人类群体的爱国主义内容是什么。我们好奇地想知道几千年来存在过哪些价值以及